

些人要和他比赛摔跤，比输了他们不甘心，把匕首往桌上一戳说比刀。刘雨田心想打赢打输都是输，那是人家的地盘，还有一个民族矛盾在里面，他不比。可是那群人不愿意，他急中生智，对酒店老板说：“我是你们县长的朋友，在你这个店里出了问题，你要负责任。”那老板就老老实实用自行车把刘送回了招待所。

1991年，他去攀登珠穆朗玛峰，在西宁的大街上遇到三个地痞。他们以为刘先生是日本人或者香港人，要换外币，刘先生说没有。他们又要照相机，刘先生不给他们。其中一个伸手就是一拳，被刘一掌挡住。另一个飞起一脚，刘先生又顺势拽住脚一掀，把他扔到路边沟里。他爬起来气急败坏地说，你知道老子是谁？说着又用头朝刘先生的腹部撞过来，刘先生平时不动武，那天他怒不可遏，来了个双风灌耳，打完就走，歹徒们看他出手不凡，不敢再追。

刘先生说，多次碰到过野兽，但没有跟它们正面交过手。他说野兽也害怕人，不到万不得已，它们不会轻易出击。狼叫是有规律的。黄昏时的叫声和深夜的叫声不同，黄昏时的狼嚎是一种呼唤，声音拖得很长，传得很远；半夜的狼嚎是一种惊吓，声音很吓人。刘先生说他总是朝着狼叫的方向走，走相反的方向，狼知道你胆怯，就可能袭击你。若遇上狼，人的腿颤抖一下它都知道，所以你要表现出比它更强的威慑力。

弥足珍贵

风霜雪雨，生死搏杀。刘雨田数次体验到了作为个体生命与大自然搏斗生与死的极限，也从生命最本原的视角体验了生命的种种形态。在近二十年的探险旅途上，他一边与死神搏斗，一边天天记录，笔耕不止，拍照片，积累了大量资料。他拍摄了一万多张照片，撰写了四百多万字的考察笔记，这些资料对研究我国历史、地理、经济、政治、文化、考古、文学等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例如在贺兰山发现了明代一壁阴山岩画，被考古界认定是一个发现，在罗布泊拍摄的野马群，为揭开罗布泊之谜提供了可贵资料。

淡泊明志

刘雨田先生脑门上有一个伤痕，那是他在北京农科院门口被一辆白色桑塔纳车撞的。当时他头上脸上都是血，司机是个小伙子，一看这情况就吓哭

了。刘先生站起来说，朋友，没事，你走吧！刚走几步他就晕倒了。司机把他送到医院，身上有17处伤，转了两次医院。伤愈合后小伙子说要赔偿损失，刘雨田说不用了，谁会故意往身上撞，又是大过年的。刘回家后发现包里有8000元人民币，因为不知道小伙子的联络号码，就收下了，后来他用这笔款作了攀登珠穆朗玛峰的费用。

刘先生十多年的探险成就名声远播，若在国外早成了大富翁，而现在他什么也不是。有人要他做个汽车广告，给他80万元人民币，还有一栋别墅。他没有答应。并说：“我的心很干净也很简单，在这个世界上做的事只有一件——探险，所以，我走到哪里都很坦荡，有正气在身。”

刘先生为了探险，用尽了所有的积蓄，也失去了温暖的家。他的业绩被国内外十几家媒体作过多次报道，已为公众所熟悉。他的探险活动也得到了海内外有识之士的鼎力相助。他说余下的生命仍然是旅行和探险。

有记者问刘雨田先生，“如果将来走不动了，你的晚年怎么安排？”

刘先生回答：在昆仑山下建一所大学，继续探险，不是现在这个意义的探险，是一种文化探险。再一个就是写书……

（作者张水旺：曾任长葛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

匪霸汉奸陈秀峰

邢海江 整理

陈秀峰，长葛县董村乡口王村人，1901年生，幼读私塾，粗识文字。15岁时，到通许县一家布行当学徒，后升任经理。

陈秀峰回县后，于1929年进入军界，当上第一区团总。到1931年更名第一区团团长。1932年改任第一区第三联保主任，后兼许、洧、长三县联防指挥官。

陈秀峰一踏入军界，就纠集匪众拉帮结派，扩充势力，铲除异己，惨杀无辜，鱼肉百姓。

1938年6月间，日军陷开封后，兵分两路，一路侵入中牟附近，另一股日军骑兵400余人从尉氏朱曲、洧川经长葛马家寨、老庄尚等村至新郑车站。这股日军在回窜至老庄尚时，曾遭到长葛“中华民族抗日先锋队”领导的抗日武装猛烈截击，打死打伤日军五、六人。当时武汉《新华日报》曾报道了这次战斗的概况。

不久，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命令新编第八师师长蒋再珍掘开黄河，放出黄水。日军得悉黄水出堤，西侵部队慌乱地撤至尉氏朱曲一带。

这时，长葛县抗敌自卫团受命出县作战，围歼朱曲一带之敌。身兼自卫团团长的县长马维珍（山西人），就出战人选作了大难。当时有些绅商就推荐通缉在案的烟毒犯陈秀峰率军出战，戴罪立功。马维珍接受了这个建议，请省府核准，允陈立功赎罪。经商会会长王瑞桐担保，派张廷弼、王凌九二人赴西安将陈找回，委为长葛县第一区团副区团长。这样，陈秀峰就由一个在逃犯一跃而为政府的命官。

陈秀峰被按上了第一区团副区团长头衔之后，他不懂军事，更谈不上率兵临阵指挥打仗。后经绅商推荐，任寓居长葛的崔鸣山旅长为“前敌总指挥”。

1938年6月18日下午，经过整顿的长葛县抗敌自卫团一千多名战士，在崔鸣山的率领指挥下，陈秀峰骑马随同，开赴尉氏前线，在朱曲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当时的《新华日报》报道了“朱曲被我收复”的消息。6月19日，在崔鸣山的指挥下，紧攻盘踞在尉氏县西南之门楼任寨之敌，下午

与国军24师同时发起攻击，激战两个小时，状极惨烈，24师一个排全部牺牲，自卫战士郭龙明，王锡金（均石象人）阵亡，郭香（左场人）负伤。

19日夜，自卫团组织一部分兵力和24师一个连由一位营长指挥，袭击盘踞冯村之敌，激战约20分钟，因驻栗林之敌来援，自卫团只好撤退。

6月25日，自卫团绕过黄水，渡过杜公河和双泊河，到达古桥休息一天，第二天经黄岗返回长葛董村。沿途又同敌人打了两次。陈秀峰的坐马被窃走，陈由卫士轮换架着退下阵来。崔鸣山率长葛自卫团出县作战，一举获胜，缴获了许多日军的枪支弹药及军用物资，自卫团回县后在石象训练时，专门成立了一个骑兵中队，所用马鞍多是从日军手中得来的。团队原来的老套筒步枪，也换成了外国造，每个队还配上了轻机枪。

满载战功荣归的崔鸣山，却成了一个默默无闻的人物。而被人架着退下阵来的陈秀峰，却偷天换日，把战功窃为已有，升任县自卫团的副司令。1939年农历2月初，全县绅商、各区区长和各联保的联保主任，还为陈秀峰立了两通石碑，以彰其抗日之功。1939年春，长葛县抗敌自卫团奉命撤销，陈又捞了一个县国民兵团总参议的名义。

1941年3月，“长葛银行”成立。陈秀峰为常务监事。为解决银行资金问题。经上级批准，只允许印“转城票”10万元，而陈秀峰擅自增印了二万元，后来石印馆又偷印一万元私分，结果印了13万元。后来群众到银行兑换时，只兑换10万元为止，下余3万元却流散在群众手中，陈秀峰等少数人占了大便宜，而群众却吃了大亏。

1941年暑假，长葛县在外求学的学生相继回县，为了加强联系，由河大学生发起邀约全县旅外求学的大学生、高中和高师学生共约50多人，在县中学成立了“长葛旅外同学会”。

陈秀峰为拉拢这些在外求学的学生，以培育人才、资助寒生为名把镇长郭奠五、县党部书记长杨景贤拉到一起，在他们三人的名子中各取一字，组织了一个“五贤峰贷金委员会”。他们利用职权，从县银行拨出一部分现款，对家境贫寒的学生每人贷给法币40元。

1942年，陈秀峰入“在理局”并任中华理教会长葛分会理事。他利用这个反动组织，纠集一伙劣绅，鱼肉乡里、坑害百姓。

1943年底，年仅22岁的朱绍曾在长葛东南部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组织起一支著名的抗日武装。

开始朱绍曾部只有40余人，与地下党组织支持的战地服务团合作，定名为“长葛抗日游击队”，朱绍曾任大队长，共产党员李清合任副大队长、

共产党员苗铁林任参谋。

为了壮大抗日力量，朱绍曾联合其他抗日武装成立了“长葛抗日救国军”，由地下联络站支持的杨灿文为司令，下设四个中队，朱绍曾为第三中队队长。全部有枪200余支，是一支很有战斗力的抗日队伍。朱绍曾抗日除奸，经常活动在县城东南一带，与卖国投敌的陈秀峰展开了斗争。

1944年农历3月9日夜里，朱绍曾率队包围苗庄苗云青（陈秀峰之表弟）的住宅，准备杀掉到苗庄赶会的陈秀峰，但却因陈秀峰事前走脱而扑了个空。从此以后，陈对朱处处小心，如惊弓之鸟，一夜之间就会投宿多处。于是陈就下决心要除掉朱绍曾及其所部。

朱绍曾杀陈未遂，又于3月19日，在官庄杀了陈的亲信朱振清，并夺走朱振清的手枪和子弹。陈秀峰得知后，吼叫，“不杀朱绍曾，吾实难生存”。从此以后，陈就施展毒计，从内部分化“抗日救国军，”以达消灭朱绍曾及其所部的罪恶目的。

1944年5月15日，陈秀峰杀掉朱绍曾及其所部的罪恶阴谋得逞了。这样就酿成了长葛的“王庄惨案”。

1943年，河南遭大旱灾，人食草根、树皮，哀鸿遍野，物贱如土，粮贵如金，1斗小麦（14斤）即可换一亩耕地。在这大灾之年，陈秀峰控制着“救灾委员会”。将上级拨给的救灾款存入银行，使无数灾民活活饿死，陈秀峰却乘人之危，买地600多亩，成了个大暴发户。

1944年4月，长葛沦陷前夕，银行将500万元现金和帐目箱连夜搬到后河镇。到秋天，陈秀峰怕日寇把现金弄走，就约集刘伯宗、杨景贤、郭奠五等人，把保险柜扒出砸开，把现金分了一部分，陈秀峰把下余部分以办学或办公益事业为名，入于他把持的“慎昌烟厂”帐上，占为已有。

1944年4月中旬，日军渡过黄河，大举南犯，国民党军队节节溃退。泛东挺进军游击队总指挥陈又新，为了安定黄泛区游击杂牌军队军心，在总部召开支队长以上参加的紧急会议上，大讲所谓战争转移，等待有利时机再作反攻，并且在会上宣布：曹志生（尉氏曹十一）、曹茂林、唐明、吴化学（鄢陵）、谭子步（扶沟）、各晋升一级，委任曹志生为泛东挺进军第四纵队少将司令，陈秀峰为第九纵队少将司令，兼长、洧两县联防指挥官。

1944年4月23日傍晚，日军入侵和尚桥。4月24日6时30分入侵长葛县城。县长孙锡璋（襄县人）和头顶一大堆抗日头衔的陈秀峰早已穿上兔子鞋逃之夭夭。日军进入长葛县城，根本没有遇到任何方面的阻击。长葛沦陷后，我党地下联络站的负责同志杨仲卿、主要成员王凌霄、冀、鲁、豫

军区敌工部干事朱晦生等同志，曾经共同研究过想利用陈秀峰的武装进行抗日，因被陈秀峰拒绝而作罢。

挂着抗日司令名义的陈秀峰，虽不愿抗日，但却甘当坑国害民的汉奸。当时从伪满州国派来的假鬼子真汉奸王理宗和王理机两个人，一经接触，陈就接受了二王所交待的任务：利用地方武力，协助皇军安靖地方，消灭土八路和地方上的抗日武装。

陈秀峰利用少将纵队司令的头衔和长洧联防指挥官的职权，在长、洧、鄆三个县范围内以公开合法的身份，协助日军安靖地方，惨杀抗日武装和抗日群众。

1944年五六月间曹十一为了摆脱四面楚歌的困境，决定向洧川、长葛一带流窜，打算与耿海兰、陈秀峰合作。当曹率部行至大桥时，接到陈秀峰派人送来的一封信。信中写道：“志生（曹十一）弟；近安，我处由满州国新民学院毕业到来的两名学生王理宗和王理机，善操日语，其任务是，专门与地方上拥有武力的人员联络，协助皇军安靖地方。吾弟如愿和他们联络，请即复信讲明，以便和他们转达介绍。”曹十一阅信后，欣喜若狂，当即命令秘书赵鸣初写了复信：“愿意联络，并请商定会晤地点。”陈秀峰接信后就向王理宗、王理机二人作了汇报，得到二主子的赞许。陈即复信与曹。当曹部行至尉氏南孟楼时即接到陈秀峰的复信：“吾弟愿意联络，二人表示欢迎。我们商定三日内在南席镇会晤，届时志生弟可率领你部主要成员与会。”

在会上按照二主子的旨意，共议成立了以协助皇军，安靖地方为任务的“长、鄆、扶、尉、洧五县联防办事处”。推定曹十一任办事处主任，陈秀峰、许子屿、耿海兰任副主任，陈尧宾为秘书长，办事人员另行招聘。会期两天。结束时大摆宴席，开怀畅饮，挥霍民脂民膏，人人面无惭色。

最后，在南席镇商会会长孙雅斋家里来了个五县奸匪大同盟。陈秀峰当仁不让地也成了这个大同盟的一员。

奸匪南席会晤后，陈秀峰利用其五县联防处副主任的职权，为独占长、洧两县地盘扫清障碍，于1944年？月，勾结洧川许海峰（字子屿），在其主子王理宗的支持下，将洧川与之抗争的河路口劣绅何子明，及其子洧川教育科长何筱孟二人枪杀在洧川县城西门外。1944年12月，大汉奸徐立五在郑州召开日本中原自治参政会。陈秀峰以长葛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他会同洧川代表许子屿、刘勋民等人，将洧川的反日派赵文灿（字焕亭）于一日夜间从旅馆骗出，杀害后撂到郑州市防空洞内。

1945年7月，他夺得了长葛县长（7月任职，8月去职）职务，当日军

8月宣布投降时，他接受驻长葛日军指挥官小林500两黄金的贿赂，保证了小林从长葛离境时的生命安全。

1944年，陈秀峰又爬上了长葛县参议长的宝座，又利用霸权势力接着当上了省参议员。

1946年又由刘瑞甫介绍，陈秀峰任国特组织“中国新建设协会”长葛分会主任，并拉郭奠五为副主任。

1947年，路俊卿又把陈秀峰拉入国民党长葛县监察委员会任监察委员。

他贿通历任县长，任命其党羽王绣文、李永祥、马育谦、李子安、杨旭初、王孝章、王四俊、王晋昌、高良才、皇甫顺、李子杰、路俊卿、陈俊明等人掌握地方武装和地方基础政权。同时，他把自己的私有枪支子弹送给地方团队，来加强同解放军对抗的实力，指挥地方团队与解放军为敌。

1947年秋，长葛解放后，陈秀峰任城防副司令。

1947年12月，长葛第二次解放后，长葛处于拉锯状态。陈秀峰纠集反动武装，妄图垂死挣扎，阻挡人民的解放事业。1948年2月，他伙同县长李乐安在石固组织“白枪会”，想利用迷信组织进行反革命活动。他与国特别动军支队长师翁达、河南军统室副主任刘瑞甫以及坐地特务王永安、王子恒发生联系，互相利用，进行反革命勾当。

拉锯期间，陈秀峰和长葛县的党政要人逃至郑州，住在他的公馆里。地方团队住在东郊的祭城，他们虽不在长葛境内，而基层政权仍然被他们的爪牙和狗腿们统治着。他们经常回县要粮、要款，来供他们挥霍。1948年9月到10月郑州解放，他在郑州又当了两个月短命的长葛县县长，时间虽短，他却不断指使他的亲信，趁人民政权尚未建立之机，带领匪徒还乡，害了不少贫苦农民。

1948年10月郑州解放，陈秀峰伪装死人由其党羽抬着混出郑州，逃往洛阳。继而又南逃武汉。

陈到武汉后开了一个转运公司，以经商为掩护准备卷土重来。不久，罗干卿（机动大队长）、杨德（自卫队长）等人，到武汉与陈相聚。他们经过密谋策划，以武汉为窠穴，以驻马店为第一道防线，以漯河为前哨，以做生意为名，派密探来往于漯河、长葛之间，刺探情报，掠取财物，企图作垂死挣扎。

陈秀峰在武汉派人到石固“利通烟厂”勒取了一笔巨款，还动用该厂连史纸100零。杨德也在驻马店大肆勒索财物，充作他们的反革命经费。

接着，漯河、驻马店相继解放，武汉解放势在必行。陈自感武汉不是久

留之地，指使罗干卿逃往西南，杨德逃往西北，陈秀峰只身逃往长沙，准备再一步逃往香港，长期隐蔽，保住自己的性命。

1949年长葛县人民政府进行了由点到面的剿匪反霸斗争，捕杀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匪霸，收缴一批枪支弹药，巩固了刚刚建立的人民政权。但由于杨德、罗干卿，陈秀峰等匪霸潜逃在外，广大群众存有顾虑，不能安心生产。县委书记马云生多次召开会议研究办法，决心要把这几个大匪霸抓回来。

1949年11月，长葛人民政府发出了捕捉陈秀峰、杨德二匪通缉令。通缉令简要揭示了陈、杨二匪的罪行，并介绍了陈秀峰的特征：

陈秀峰，身高5尺，体胖肚大，异乎常人，约300多斤重，园方脸，黄白色，眼窝下少发暗青色，双眼皮，耳垂大。

通缉令还提出：任何人如获二匪归案均予重赏。捕获陈匪归案者，当予人民币30万元之奖金。捕获杨匪归案者当予人民币20万元之奖金。

通缉令发出后，时隔两个月的1950年元月12日，长葛人民政府即接到了湖南衡阳市公安局发来捕获陈秀峰的电报。

县公安局接到湖南衡阳市公安局捕获陈秀峰的电报后，立即派公安局侦察股长何承海同志带了三名武装人员前往。于元月下旬，顺利地把陈匪押解和尚桥车站。第二天就用一辆牛车把陈拉回县城。

陈秀峰归案后，经过四个月的审讯、核对，查清了陈的种种罪恶事实后，县人民政府具实上报，等候上级审批。陈秀峰血腥统治长葛人民20年，罪恶昭彰，罄竹难书，经他手杀害的民众和革命同志据不完全统计就有69人之多。诈取的民脂民膏除其全家及其匪徒恣意挥霍外，还买良田1500亩、房屋100余间。

同时他糟蹋妇女一百余人，用陈秀峰自己的话说：“我是个大罪魁，我该乱棍打死，我该枪毙300次。我是肉汤里煮鸡蛋，是个大混蛋”。“我是罪上加罪的人，我愿受人民的任何处理。”

1950年5月9日，许昌法刑字第149号指令，转奉河南省人民政府1950年5月6日指令核准：

“此反革命血腥统治之徒，实为人民公敌，批准严处死刑。”

长葛县人民政府接令后，立即组成由全县各界代表参加的特别法庭，紧接着在城北关外双泊河滩上，召开了一万多群众参加的公审大会，枪决了这个血腥统治长葛人民20年之久的公敌，解除了人民切齿之恨，稳定了人心，巩固了人民政权。

（整理者邢海江：曾任长葛县检察院副检察长、市总工会调研员）

杨德怎样从一个贫民成为匪首

高根离

杨德（1907—1951），又名杨卫五，家住长葛市后河镇赵楼村东头。当初家贫，目不识丁，曾磨豆腐为生。但此人善于心计，后来，从当上保长到结伙拉杆，得到郑州专员王光临的支持，疯狂扩张势力，遂成长葛县一霸。暗杀众多的共产党人、八路军和与之有联系的人民群众等。解放初期，1948年10月杨德畏罪潜逃，后被公安机关在宁夏吴忠市捕获。1951年9月在长葛公审处决，广大人民群众拍手称快。

一、家庭基本情况

杨德父母一生务农，家境贫困，八口人，地没一亩。全家人生活来源主要靠其父领着种村上的官地（庙地）6亩维持生计。杨德弟兄四人，大哥早亡，杨德排行第二，三弟在家跟父亲种地务农，四弟杨德成（又名杨四）思想比较坏，一直跟杨德当土匪。

杨德的父亲和大哥死以后，由杨德治理家务和外事，他三弟德成在家领着种地。1940年以后他家已发展到17口人，拥有耕地200多亩，牲口、农具齐全，经常雇有长工六七人。成了赵楼村较富裕的大户，有钱有势，和从前不大一样了。杨德本身有5口人，3个儿子。1948年初春赵楼解放，杨德三弟带领全家和杨德的老婆及两个儿子外逃陕西省白水县定居。

二、从小商贩到当保长

杨德1907年出生，1932年已学会磨豆腐、做凉粉，经常在本村集上卖小饭，此人心眼较活，手段较高，还学会厨师技艺，谁家有红白喜事不断请他帮忙，这是当时他全家生活的出路。同时，又和村民合开一个小商店，经商做买卖。

1932年赵楼村有两个保，两个保所派粮款出入很大，因此，赵楼的四大姓赵、王、陈、夏联合起来告状，推举杨德当带头人，花钱由这4姓出，告状由杨德上前。经过6个月的时间，官司打赢了，两保保长都不干了。一年时间保里差使没人过问，镇上来人安排保长，大家公推杨德接保长，他却假意地说：“我不能干，我家8口人指我吃饭哩。”当时四姓的代理人说：“德，你就干吧！你这八口人由我们大家包起来。”杨德又说：“咱告状的原

因，是叫群众少出粮钱，咱要是再这样做不是和他们一样么。”大家说：“你看如何？”杨德开话了：“既然大家让我干，不必多说，我答应，但是我只干一年，以后大家再做安排。”

1934年他27岁时当上了保长。那时期形势很乱，十户一个甲长，他增了一个代表，上级分下来粮钱，都有这些人按土地分下去，上边下来人要粮钱，各种招待费用他个人都一手承担。一年之后，即1935年，他声明不干保长了。召开群众大会公布账目，又把村上的神（老关爷）放在桌子上说：“我杨德若是贪污群众的一分钱，叫我家里八口人死完。”群众接着说：“德，谁说你贪污了？你就是不公布账目，大家也信你。这一年下边出得粮钱没上任保长时出得多，说什么你也得干下去。”当时村里几位老人跪在他面前恳求，他才答应。这次会议杨德达到了目的，他树立了在群众中的威信。那时社会股头多又乱，各把一方，杨德的野心慢慢出现了，当了半年保长就又不干了。他的说法是：您看现在多不平稳，今儿这家抢了，明儿那家打死人了，我是没啥，你们这些大户，如有一户出了事，我也清闲不了，可我手里连寸铁都没有。有人应说：“保长说这话是为了大家安全，也是好心，我想这样办，我们村有42支看家枪，集中起来，个人的枪还个人保管、集中到保里打更。”大家一致同意，说这是个好办法。因为这些枪都是富户老财的，在农闲时他们的伙计晚上打更，农忙时务农。8月种麦时伙计们白天干活晚上打更身体不支。有枪的42户不得不找杨德说好话，主动提议，集中枪支，人员由杨德调配。杨德要求，三种人可以进入武装队伍，一种是小偷小摸的给他安排住；二种是单身汉没人管的；三种是当过兵的。这三种人给他找个事干，就不再胡混了，让他终年有事干，忙时整天到地里看庄稼，农闲时晚上放哨防止坏人入村。麦收后各户给他点麦，秋季玉米、红薯多少再给点，让打更的吃。将这些人组织起来达到了杨德的目的，枪多的成为朋友，枪少的设法没收，统一集中起来，由他指挥。其间杨德的保长已让给他人接任，赵楼村由过去的两个保合并为一个保。

三、扩张势力、成长葛一霸

杨德当保长后的第三年（1936年）开始掌握了枪杆子，至1938年他的组织队伍扩大，枪也多了，为了显赫自己，开始铲除异己。首先杀的是禹县无梁镇高占源（白马寺村人），高占源常在许昌县一带抢富户人家，数次作案后留姓名，许昌专署下令谁捉住高占源就封为剿匪司令，杨德指派人将其抓获，带到陞山寇家，将高的头割掉。接着杀害海子李村李自源，此人因写呈子叫杨德告状出名，杨怕李后生歹心，将其除掉。又谋害同村人胡宝珍，

胡是医生，平时肯给杨德出主意。一次杨派人叫胡宝珍把枪交出，胡交迟，杨派三个人，于9月16日在水磨河会上将其枪杀。事后杨德还装好人，要追打手，并安排了胡的埋葬。1942年4月2日，杨又指派人将无梁黄山村的方新喜（是匪首，夜集昼散）打死在赵楼会上。同时将赵楼名人、晚清秀才陈自立枪杀在姚店东炮楼。

杨德把这些人除掉后，即和山北（新郑人）土匪李红周合并，下半年与孟排村的侯庆甫合并，这三起合并后有130支长枪20多支短枪。随后雇无梁曹楼村的曹庆到赵楼造枪，又派富户家买枪。这时人员通过整编，起了队号，叫保安三团大队，队长杨德，副队长侯庆甫、张子善、李红周。制定了扩充队伍的优惠条件：一是每人联系1个，10亩地不出公事，不出壮丁，没地的人每年500斤小麦为安家费；二是凡在大队的人都以亲兄弟看待，再大的事由队里包起来，不让个人负担；三是所有团员拉进15人才可当班长，30人者可当排长。凡进的人须有担保人，才可任职。自此杨德势力日炙。日本鬼子来时，他更加猖狂，把他的人员改为救国军，他不懂军事，并没和日本打过大仗。为了要粮要钱，他和侯庆甫、李建堂合谋分工，于1945年2月一天杨德去长葛打死日伪县长武俊甫（后河山孔人），同一时间侯庆甫去后河打死日伪镇长武宾（武俊甫弟），李建堂去石固镇打武子焕（武俊甫父亲），李建堂与武子焕有私情，头天晚上李先去送信，第二天早晨李去石固打了空枪。这一下杨德更出名了，日本人给他送外号是“羊毛”，群众看到他厉害，流传说：“谁坏良心，叫出门碰见杨德”。

杨德之所以敢打死日伪长葛县县长，说明那时他的根子硬，有后台支持，这就是郑州专员王光临的支持。

1944年春郑州沦陷，专员王光临带家眷和跟随人员到新郑千户寨高九如（时任密县保安团团团长，王和高是朋友）那里避难。不料，4月21日日日本军攻打新郑，县城失陷，县长李日商带政府人员撤至风后岭，正在这里避难的王光临、高九如看势不妙，南撤禹县东地黄台寨。当时高九如只有30多人。一天，岳德忠（又名岳狗头）部下一个连将黄台寨围住，声明要缴高九如的枪，杨德与高九如是朋友，得知消息后带200人到黄台救出高九如、王光临等。岳德忠势力比杨大几倍，得知他的部队受到杨德打击，第二天带他的大部队来到赵楼附近村驻扎。此时杨德组织学校师生敲锣打鼓把岳德忠请到他家住了两三天，吃喝不论，还说只要我有的东西你随意要。岳爱骑驴，看中杨家一头大青驴要了，走时杨德又给他一排缸大烟，就这样杨德又和岳结为换帖兄弟。杨德名扬一方。

杨德至黄台救出高九如、王光临后，他们3人遂成患难之交，从此王光临和他的家属、警卫就住在赵西王世纪家空院。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王才离开赵楼重回郑州复任。

日寇投降时剿获的枪支弹药，王光临交给杨德长短枪800支，子弹无数，并封杨德为13县剿匪司令，吃13县粮，赵楼寨又起个名字叫“忠义”寨，国民党队伍十里以内不准驻扎。杨德势力更加强大，队伍发展到近2000人。1946年7月李乐安出任长葛县县长，与杨德的势力，那时是狗狼两怕，李为分散杨的势力，请求上司把侯庆甫、陈瑞伍调禹县任大队长，杨德任长葛自卫大队长。1947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渡黄河南下，李乐安心内恐慌，把全县所有名头人物都集中起来，组成两个机动大队，以张惠民、杨德为首。杨德改任第二大队长，他们的口号是：积极反共，百战百胜。当时中原处于拉锯状态，杨德再作垂死挣扎，不断流窜各地，他们为了图生存，利用故交，1948年经郑州专署批准，将长葛机动总队改名为“郑州专署保安第三团”，杨德任第三大队长、张惠民为团长。

1948年正月22日，活跃在伏牛山区的皮定均司令员的队伍，从禹县无梁下山来，杨德闻知当即将队伍拉出寨外遁去，下午古城镇自卫队进赵楼，晚上八点钟，赵楼寨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开，赵楼成为解放军根据地，杨德再没敢回。解放军独立团团部就住在学校内，其余人员住在各家各户。赵林法（连长）任后河区长，经常到各村收大户的粮食支援前线。

四、反共抗共 杀人不眨眼

杨德自当上保长到结成匪首，他一直仇恨共产党，与人民为敌，特别在他兴盛时期，疯狂杀害共产党人和众多的革命战士。根据长葛县志记载：杨德于1945—1948年间，先后枪杀共产党员、八路军战士30多人，杀害与共产党、八路军有联系的村民40多人，铲除异己25人。当地群众普遍认为，杨德杀害的人数，还要多。他手段毒辣，杀人不眨眼，他想枪毙谁是口到擒来，看到有可疑的，包括他的朋友，拉到队部先审后活埋或枪毙。

1947年春，杨德在水磨河，他的朋友杨子祥（宝丰人参加八路军）和魏富山（小李庄人，参加禹郑独立团）张留成（营张村人，参加禹郑独立团）三人找他谈话，劝杨德起义投诚共产党、八路军，杨当时虽口头答应，但心中不满。先将张留成打死在水磨河东门外，又对杨子祥、魏富山说：“走！跟我回家再说吧”，到侯庄南地将杨、魏二人开枪打死。1941年赵楼村赵黑子（又名赵子明）在延安参加红军回到家组织红十字会，宣传党的政策，不留神说话暴露了身份，杨德对其有怀疑，于1944年杨德将赵诱出

赵楼打死到长葛（今老城）东关南边。禹县无梁镇白马寺村宁忠亭，1946年冬他家是八路军的联络点，皮定均司令员不断在他家住，他是个丈地委员。杨德知道后于1947年春，组织百多人去抓宁忠亭，忠亭侥幸跑掉，家却被抄，牲口、农具、粮食等物给一抢而光。1947年4月19日大刘庄高丙午（禹邾独立团侦察员），回家了解匪情起抢，被土匪发现，告于杨德，杨德派打手在村西南田间将高丙午抓住，带到村东北地暖泉河头开枪打死。

1947年7月17日晚，杨德受长葛县长李乐安指派，率打手赵水彬、陈中科、陈宝珍、白守义、高同喜等，在后河东大庙学校将共产党员陈英逮捕，带到赵楼村东地菜园庵里。杨德令陈全喜、陈中科二人回村拿家伙，又布置其弟德成带人到东北地陈公祠南边地头沟崖处去挖坑。杨德和赵超凡（镇长），用威胁诱骗手段叫陈英说谁是共产党，赵超凡拿笔记名字，打手王彬甫用电灯照明。杨德对陈英严刑审讯，陈英坚贞不屈。审问后杨德说：“走吧，叫你走哩”，走到后河去赵楼的东西大路时叫陈英往东北方向去，陈英愤恨地问道：“您？您叫我往哪里去呀！”杨德答道：“走吧！叫你回家哩”。拉着，走着。走至离坑20来步时，杨德对打手下令说：“您还不下手。”接着打手陈中科、陈全喜、赵水彬3人，用手巾塞住嘴，将陈英勒死，抬到坑里埋了。除此凡进赵楼担挑游乡可疑人用残忍手段审讯后害死者很多。

五、兔子不吃窝边草

杨德经常说：“自古以来，有一句俗言‘兔子不吃窝边草’，有钱给穷人家，开口不骂老人，抬手不打小人。”赵楼是个大村，又是个较穷的村，村民因家贫解放前出外逃荒的多，杨德主事时，凡从外面逃荒回来的，你九点到家他十一点就去你家，首先是安慰，该叫啥就叫啥，架子不大，然后安排他手下人送去米面，过一段再送去点，一直管你吃到麦熟，他就不管了。保长甲长从外回来，杨德还派人给收收打打麦子。帮助弄到家，他还去家送些买油盐钱。有时还把人叫他家：××叔，房子破了派几个人来给你修下，把伙盘住，再找个人到学校拉几百斤煤，安置吃住，安排得停停当当。只要是他说过的一定做到，停几天还去再看看。他这样做是有目的哩，看你是块料，停几天就安置你当兵。这些人对杨德感恩不尽，家内老人还交待去要好，你看他对咱多好呀。杨德还有个特点：不吸烟、不赌博、不嫖女人，这点最得人心。

1945—1946年杨德把外地的古庙拆掉，拉到赵楼建了学校，不论家内贫富，都叫孩子们就学。因为他本身不识字，经常开会说：“我死不到草铺上，我要给赵楼的下代办一件好事。”

六、土地无一亩 怎样成地主

杨德家起初土地无一亩，他父亲靠种6亩官地，又名庙产地维持生活，养活4个儿子。他自1934年当上保长，后来成为匪首以后，很快发展成为拥有200余亩耕地的大地主。其地从何来？这中间有来由。

首先说官地。赵楼东北有个樊楼村，村内有一大户，名叫樊银生，他家在前清时挂千顷牌，相当富裕。那时长葛有个县长，人送外号“小金官”。终日想办法向樊银生要钱，但是不论用什么办法就是弄不住钱。经过几年时间，终于想出一个办法，“小金官”巧用一种手段——丈量土地，多者归公。樊银生当时不在意，因他家住在半山坡，你丈量土地也是从下往上丈量，结果这位县长从山顶向下丈量，除去樊银生千顷外，剩余540亩好地划归陈公庙（陈寔庙）所有，以后就叫官地。

这官地在赵楼村东，由该村村民耕种，长葛县长收租子，从前清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1939年此官地由长葛县陈秀峰（县大队长、县长）接管。陈派燕金锡（石象人）常住赵楼负责收540亩地租，上交陈秀峰。这时杨德还没权势，是个保长，想与陈拉关系，就通过燕金锡，主动安排马车把收的地租送给陈。每逢年关杨德再给送去些酒肉、菜类等礼物。杨、陈关系逐步密切了，燕金锡也无权再负责收地租，他就走了。1944年春日本人来，在郑州专署专员王光临的支持下，杨德势力扩大，杨接管了540亩官地，其中180亩划归自己家所有，其余420亩让赵楼农民耕种，杨德收地租，养活他的部下兵。

其次，尉氏县民国时期有个叫“曹十一”的大土匪（群众称：大河东土匪曹十一），他的秘书叫刘文宪（都叫刘副官）。1940年赵楼人在尉氏修贾鲁河大堤，生活一时发生困难，找刘文宪帮了大忙，以后相互关系很好。1941年刘因公差来到赵楼住，杨德为谢前恩，帮助在村北给刘买了70亩地，雇人耕地。至1945年曹十一不用刘文宪了，杨德也不用他，刘就无奈回尉氏老家啦，这时杨德接种刘的70亩地归自家所有。

再次，1942年荒年的时候，赵楼村很多穷人家外出逃荒，家里留少量土地，大约有二三十亩，杨德将其地种了，收获归已有。出外逃荒穷人回来后，杨德又把这部分土地还给人家。

以上三项土地加起来，杨德家共有耕地220亩左右，除去还给穷人家的地，杨德家实有土地190亩左右。

七、杨德的主要骨干分子

杨德主要骨干，有各个方面的专长，都是些有才干的人。这内边有出谋

划策当助手的；有精通军事抓操练的；战时有打冲锋的；有警卫和保镖的；有催收粮款管生活的；还有专门打黑枪的等。根据老人回忆主要有以下几人。

1、陈瑞武（小名陈水法）赵西村人，农民出身，家境较贫，从小卖煤，做小生意为生。1932年以陈为主结伙拉杆，夜集明散。杨德当保长后，劝陈归顺，先让陈打死其骨干高占源（禹县无梁白马寺人）、方新喜（禹县无梁黄山村人）等人。陈有勇有谋，枪法又好，杨德保长卸任，当匪首后任命陈为副大队长，出谋划策，杨德想打谁，需先通过陈。

2、陈中科，坡胡镇小李庄人，是个地方耍痞，会点武术，徒手能上高楼，练一手好枪法，1944年跟杨德。1945年农历8月一天晚上，杨德带百多人，去禹县郭店镇陈楼村攻打土匪朱德志，（该伙有几十个人，夜集昼散，抢人抢物）杨想消灭朱，夺他的枪，这回就由陈科打冲锋。这天朱德志在家，被包围，天亮开始打，朱在他楼上发话说：“你们想要啥？”杨在下边答：“要枪”！朱将一支德国造20响由楼上扔到院内，陈手下人何金旺（大刘庄人）跳进院内拾枪，被朱的妻开枪打死，杨德此时恼火。朱夫妇都是好枪法，在楼上不好消灭，让陈中科安排用两罐炸药，埋在西墙两个角下，轰的一声！楼房被炸塌，朱德志夫妇被砸死废墟内。家中未9岁的闺女哭叫爸、妈，陈中科跟班骨干赵新田上前掂住小女孩腿，用手脚一撕两半扔了。朱一家3口人被灭绝，夺回所有枪支。事后杨德在暖泉观安排两台大戏唱了2天3晚，庆贺胜利，追悼死者。

3、张子善，原籍山东人，国民党军队团级干部，在河南转业后招赘落户到后河芝芳村。1944年经他人介绍到杨德部下当冲锋队大队长。张懂军事，对外作战，由他指挥打冲锋。

4、陈丙寅，赵楼村人，农民出身，1944年跟杨德当警卫。陈办事比较稳妥，左右不离杨。

5、陈文渠，赵楼村人，农民出身，1940年跟杨当警卫，此人天不怕，地不怕，办事不稳，很粗暴。

八、罪有应得

杨德，流氓匪霸身份。系长葛县著名匪首。解放前残害我地下共产党人，进步人士，血腥镇压长葛人民，罪大恶极，血债累累。长葛解放之际，本应缴枪投降，他却变本加厉，率部督战，与共产党解放军对抗十余次。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杨于农历5月潜回长葛串联，组织暴乱未呈。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迅速发展，杨德魂丧胆飞，畏罪潜逃。先是逃江南，尔后

逃宁夏吴忠市。他扮演一个星称的，到处找熟人老乡安身。所到之处都改换姓名，曾化名叫李学文、李书庆、张振范、张义亭、乔新义。一说他老家是禹县，又说他是河南密县人。

长葛县公安局派员于1951年7月到杨犯住地——宁夏吴忠市将杨德押回长葛，审讯后，经上级核准，于1951年9月11日，长葛县人民法院在县城召开公审大会，判以极刑，杨德终于服法了。

长葛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末段为：

“本庭为保卫人民生命财产，维护社会秩序，巩固人民民主专政，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反动活动，根据镇反打倒第二、三、四，三款规定，判处该犯极刑，以正国法，而除民愤。”

2007年6月稿

（作者高根离：长葛市坡胡镇人，退休干部，地方史志爱好者。）

第六编

政治经济

长葛民众一九一零年抗税砸大堂

赵拴柱

在清末及民国时期，长葛民众的抗税斗争接连不断。其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是一九一〇年农历六月十五日爆发的长葛四乡群众“砸大堂”的抗税斗争。

清宣统二年（一九一〇年）农历六月初，长葛知县江湘借口办乡村警备队，命令各乡每粮银一两加警务费三百文，并召集各保绅士开会，共议增银办法。各保绅士因触及本身利益和害怕农民反抗，未敢答应。江知县声称：乡村办警备队增银一事，乃前任潘知县所定，此事已报上司，不能挽回。执意要各保遵命照办。各保绅士见势不妙，只得口头答应照办，脱身出衙。

当时长葛县的大首事有樊继宗、郭毓瑗、司先登、黄银、耿重光、李正希等人，他们对江湘此举实为不满。于是开会计议，利用农民对政府的不满，组织农民起来反抗增银，借以威胁县官。计谋一定，首事们立即通知各村，并向各地散发传单。当时的传单上这样写：“各村父老同看，江官到任，即科差派钱，一年就派七次，我们实在不能负担。今天江官又增派了地钱，我们性命不能保全，屡次呈恳免缴，银子有增无减。官逼差，差逼民，我们身家实为贪官所食。今为商讨抵制办法，各乡土民速到县城隍庙集合，不来者不算好汉。”

消息传开后，农民对官府异常愤恨，立即鸣锣四乡，奔走相告。农民对官府的敲诈行为早已恨之入骨，听说又要增银，立即轰动起来，互相联系，约定要在六月十五日进城找“江官”说理。

十五日早上，各保农民有男有女，扛着扫帚、犁耙，拿着绳索，成群结队到县城来。农民愤怒地说，“这也要税，那也要税，老百姓怎么活？老百姓不种地了，把农具交上去，让县官自己种地吧！把大堂扒了！”

宏任保农民最先来到县城，在城隍庙集合。他们首先把庙里历任官吏和江湘送挂的匾全部砸碎。其它各保农民也先后来，达五千多人。广大群众对神发誓，要齐心协力抗税，并在城隍庙放了火鞭。雍睦保农民也放炮响应。打渔李村农民商高山更爬到树上大放鞭炮。群情激昂，蜂拥而至，将县

衙团团包围。知县江湘被迫出来，群众用砖头、棍棒对他袭击，质问他为什么要增银？县官四面向群众作揖谢罪，并叫皂班张荣贤扛着“一切免缴”的牌子，保证免银，让群众回去。群众怒气难消，手执棍棒，涌进衙内。

江湘在首事杨金彪和把总宋清泰的保护下，狼狈退入后衙，同其妻室在班头陈自祥的护送下，越后墙逃到“大生恒”钱铺躲了起来。民众随即进入内衙，把衙内的锅、碗、轿车、玻璃、皮箱等物一概砸碎。群众越来越多，中午已达万人，一直把大堂砸得一塌糊涂，到天黑才慢慢散去。

长葛民众“砸大堂”事件发生后，许州徐知州立即报告上司，请兵镇压。河南巡抚宝棻谕飭陆军一营五百余人前来镇压，由管带包荣耀带领，随行的还有一个徐统领。这些兵丁从开封乘火车，于事后两天赶到长葛，驻扎东西两关。清兵一到，即“发无名之票四出抄掠，随意罗织，择肥而噬[注一]。”仅宗寨一村被抓者就有四十余家，皆纳贿开释。王宝成贿银五十两，魏灿星贿银五十两，魏凤舞贿银二百两。清兵还传谕全城乡筹银一万二千两作为赔偿江湘之款。“指拿樊继宗、司先登，郭毓瑗以为祸首，沿门大索，远近骚动[注二]。”

此事传到翰林院编修杨佩璋和户部主事员外郎张蔚兰耳朵内（二人均系长葛人），他们以库房未动，监狱、账房未开为理由，驳斥徐知州的报告。清廷派御史陈善同亲临调查。陈善同系河南信阳人，光绪二十九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晚清时，历任大理院推事、御史等职，以敢于秉公理事闻名朝野。陈善同见长葛民众安心生产，库房、账房、监狱确实未动，仅大堂被砸。况此事实由江湘加征粮银引起，就于农历八月十七日向清廷上了一个奏折，不仅重参了长葛知县江湘，还指责了河南巡抚宝棻。因此，所派清兵很快又调回开封。县官江湘在大堂被砸之后，所有衣物无一存者，狼狈不堪，很快就被调离长葛。宝棻另派潘守廉为知县。长葛群众“砸大堂”的抗税斗争，就这样以江湘狼狈滚出长葛而告终。

长葛民众一九一〇年反捐税斗争胜利了，有力地打击了贪官污吏。后来长葛人民还把这次斗争编成戏曲，在群众中广为演唱。第二年就爆发了辛亥革命。

[注释] [注一]、[注二] 引自陈善同奏折。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

（作者赵拴柱：曾任《长葛报》副总编辑）

辛亥革命对长葛的影响

王世荣 整理

长葛人民素有反抗压迫的韧性，早在辛亥革命前一年，即公元一九一〇年，就掀起了震惊省内外的抗捐抗税的“砸大堂”事件。在反对贪官方面，从清末到民初，仅十年间，就有七位县官被控免。后来有位武装领官于占标，竟迷信地认为民众告官，是因县衙门外有“两座影壁”之故。后经拆修改作一座，结果也没止住民告贪官。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即清宣统三年，农历辛亥八月十九日，在武昌爆发了推翻满清帝制的辛亥革命。消息传来，无不欢欣鼓舞，除互相联络，准备响应，最突出的一点是剪头发辫。

笔者走访张怀玉（71岁，离休教师）、陈铁松（73岁，离休教师）、陈清瑞（75岁，离休教师）、钟秀亭（82岁，离休医生，）等座谈，兹将其从父辈口中所闻及的一些实事佐证，整理成此文。

按照清朝制度，成年男性无论官民皆须蓄留头发长辫，否则，即认为不愿臣服，就有杀头危险。故一些有识之士，对此种民族压迫的象征，则深为藐视。所以剪发辫就成为反抗压迫的具体表现，要担很大风险。

笔者先父王朝选公（字殿臣，1893.6.17—1938.4.7），时在县巡警教练所任职。闻武昌起义，即联络县城北门里之张庆恩（字鹤亭，民国时任开封省会警察署署长），衙前街张水泉，吕祖阁后街张得基，县西北打绳赵村赵秀堂，城东南陈尧村陈鸿范（字衍九），陈鸿均（字陶五）等人，密谋响应武昌革命。

县警务长钟廉敬（邑庠生，县城大南关人，民国时任北京国会卫队队长等职），对当时腐败现象早已不满。只是碍于清政府耳目众多，且县西北官亭驻有清军八旗旗兵，所以对先父等人之革命活动，只能暗中支持。是时，陈鸿范，陈鸿均之胞兄陈鸿畴（字锡九，邑禀生，日本早稻田大学及岩仓铁路学校毕业，和许昌人张仲端同时参加同盟会。民国时任北京国会议员，住北京西城邱祖胡同），兹奉孙中山先生之命，从日本经上海返里，进行革命活动。

先父朝选公和陈鸿范、陈鸿均应约往见陈鸿畴，经过密谈，遂又联络许

多同志，并歃血为盟，订立“盟书”。后听先父说，“盟书”交于一位叫“魏师爷”的保管。

这时清军已源源南开，频繁征派粮款，民不聊生，民怨更加沸腾。先父遂和张庆恩、陈鸿均赴县西和尚桥联络驻铁路警察及“在园会”会友（一种社会秘密组织），并与新郑县人吴沧洲（字古岳，时任清朝新军第二十九协炮兵营排长，民国时任南京政府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和浙江、江苏、江西三省特派员等职）取得联系，拟炸毁平汉路和和尚桥车站站南铁路桥，以阻止清军南下。

先父等联络后回县，即剪去头发长辫，以示革命决心，并拍摄照片以作纪念。他们几个核心人物剪去发辫后，在巡警教练所内遂互相剪开，逐渐推向社会，遂开长葛剪发辫之始。

时隔不久，突闻革命党人张仲端在开封起义失败被杀，形势骤然紧张，清军八旗兵已进驻县城。警务长钟廉敬又透露，但等令下就要抓人。先父闻此，迅即告知陈鸿畴避往上海。魏师爷会同伙夫（亦在盟书中同志）将“盟书”填入煤火内烧毁，使许多人才免遭危险。

后来，他们又组织了一个以尊孔为名的“圣会”，每年农历二、八月春秋大祭，轮流备餐，欢聚叙旧，一直延续到抗日开始才停止。笔者孩童时，常跟先父去参加他们这个“圣会”，听到不少清末民初闹革命的事。

一九四九年春，笔者在苏州专员公署工作时，有幸晤到吴沧洲老人，一九五〇年笔者从华东军政大学回开封时，去南京南仓巷12号吴老处辞行，都曾谈到陈鸿畴和长葛闹革命剪发辫的事。吴老还把他新写的诗词，让我带给开封山货店街南头路东民革河南筹备组召集人刘积学先生。

一九四一年，笔者和同学刘希贤（本县西山孔村人）到后河镇杨景尧同学家闲玩，碰到辛亥革命老人刘峰一先生（河南安阳人，抗战时逃难来长葛，住山孔村吴子焕家。抗战胜利后，任河南省参议会参议员），他也多次问到陈鸿畴的情况。

时光流逝，辛亥革命迄今已八十年。当时革命先驱谅已作古，即是第二代第三代，健在者恐亦不多。谨整理几位老人的片断回忆，殷望知情者，予以补充、订正。

一九九一年九月二十三日

（整理者王世荣：长葛市老城镇王庄人，县政协委员，史志爱好者）

中共长葛县地下党在开封

董金瑞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后，力行中学（私立）由卢氏县迁到开封省政府西街（省参议会西院）。当时我任该校筹备主任，随校前往。回开封后任该校总务主任。

翌年秋，中共长葛县委统战委员陈伯瑾、妇女委员辛瑞芝到了开封。见面后，陈伯瑾同志说：中共长葛地下县委领导郑义亭被捕，组织通知所在地地下党员转移。并说，我和辛瑞芝同志转移到南京，由我弟瑞图（1938年长葛县建党后任县委宣传委员，是笔者入党的介绍人之一）介绍，在南京新华书店和董必武接头（瑞图在西南联大上学时，曾接受董老领导），接头办法是让我俩到南京新华书店看书，看了半小时书，把瑞图给我们的介绍信夹在书里边，亲手交给服务员就走了。次日我俩又到南京新华书店看书。刚坐下，服务员说：“请到里边谈谈吧。”就这样见到董必武，我俩要求到解放区工作。董老说：“现在国民党对解放区封锁甚严，不易通过，为安全计，你们还是回河南开封，谋一工作掩护，以待时机。”

伯瑾回到开封后，由其堂弟陈瑞电（开封警察局二分局局长）周旋，到开封市税务局工作。从此我们三人就经常见面谈思想，谈形势，记得1947年春看到《河南民报》号外登延安失守消息时，我马上跑到陈伯瑾家，心情十分沉痛地说：“糟糕，糟糕！延安失守。”陈伯瑾、辛瑞芝都说：“我们看到报纸以后，也有同感。但再一想，一地的得失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败，还要看其他战场呢？”顿时使我茅塞大开。

1947年，原中共长葛县委青年委员辛金生同志到开封，住在陈伯瑾家。当时由辛瑞芝通知我和他接头。见面后谈了革命形势，交换了认识后，辛金生同志说：“我们虽没有找到组织，但我们共产党员，为了集思广益，坚持革命斗争，应该成立开封党小组，继续向敌人作斗争。”通过讨论，决定推陈伯瑾为开封党小组组长，辛瑞芝负责组织，董金瑞负责宣传。辛金生同志又回许昌找翦成来和闫位中联系，成立许昌党小组。我们在陈伯瑾组长领导下学习过《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对胜利充满信心。

自从成立开封党小组后，我们三人经常在一起讨论如何开展工作和我们的处境安全问题。记得有一次陈伯瑾同志说，“我和瑞芝在开封有堂弟陈瑞电掩护，全瑞，你有族弟董永昌（第四绥靖区司令部高级秘书）掩护。但我们不能光叫他们保护我们，还应当争取他俩为我们作些有益于革命的事情，你们说对吗？瑞芝和我都同意他的意见、决定后我每星期日到永昌弟家中玩。在他家常常见到长葛县中同学朱振中（时在省党部工作）、黄廷选（时在省军管区工作）、孙国珍（时在省党部工作）和我的族叔董书林（时任力行中学训育主任，中共党员）等。我们这些青年人每次谈到长葛县情况时，大家都一致认为劣绅掌权，老百姓遭殃。我乘机插话说：“咱们在开封成立长葛县同乡会，以长葛县同乡会名义，替老百姓说公道话多好。董永昌赞成，朱振中、黄廷选、孙国珍等没有意见，后通过同乡们酝酿，不久就在社会处成立“长葛县旅汴同乡会，并选出黄廷选、孙国珍、董书林等人为理事；朱振中、董金瑞等人为监事；董永昌被选为理事长。后来“长葛县旅汴同乡会”在开封城隍庙街买了一所房子作为会址，同乡会也给长葛县人民作了些有益的事情。现在想来，大致有以下几件：

一、董永昌利用当时的军队职务给董书林和我搞到开封城防司令通行证各一枚。这对书林我俩从事地下工作，起到很大的作用。

二、一九四七年春，长葛大墙周乡后张村薛某到开封卖菸叶，在开封南关行走被当地驻军抓去当兵。长葛同乡董聚太找到董永昌，说明情况后，董永昌以第四绥靖区司令部高级秘书名义给开封南关驻军打电话，当即释放。为此，其子薛国领近年来曾多次看望永昌，以表谢意。

三、营救进步青年学生郭学莲等。开封人曹木貽（女）1941年春在长葛县石固镇小学教书时和陈伯瑾、辛瑞芝是同事。她的女儿郭学莲和学莲的两位女中同学，1948年2月以共党罪被捕，曹木貽托陈伯瑾找董永昌营救。经奔走后，需要履行具保手续，方能释放。最后商得长葛同乡朱振中、孙国珍同意具保，郭学莲等才恢复自由。

四、“六一”大逮捕后，董永昌发现黑名单上还有大公报特派员、进步作家、名记者李辛霖漏捕，当即请同乡会监事朱振中到郑州送信。振中走后，永昌怕延迟了时间误事，当夜他又乘车到郑州迅速通知李辛霖安全转移武汉。

五、1948年春，陈谢大军解放洛阳后，开封的特务活动加剧，这时陈伯瑾同志住在陈瑞电家，他因为要到各商号收税，所以接触的人较多，故而被特务发现。省保安司令部令刘艺舟亲下手谕，并派特务到陈瑞电家抓陈伯瑾。当时陈瑞电以二分局局长身份担保，陈伯瑾未被捕，但后来却撤销了陈

瑞电二分局局长职务。与此同时，原中共长葛县委宣传委员陈瑞图也到了开封，我们对他的安全，也捏了一把汗。

1948年夏，开封第一次解放时，天不明解放军就进入我的学校敲我的屋门。我马上起来开门，进来两个战士说：“请给我们点水喝。”我说：“有一担不是开水。”战士说：“什么水都行。”我即到厨房给他们打来温水。战士们喝罢水后就走出屋门，到墙边挖洞。我及时劝阻说：“从这里过去是大街，从我住室后边墙上挖洞过去是参议会院里，可减少危险。”战士们从洞口过去后，我回到屋内准备开水，接连不断的战士从我这里过去，并能喝到开水。

枪炮声刚停，我即从开封西区跑到开封东区辛瑞芝、陈伯瑾家汇报工作和请示。经共同商议后，决定由陈伯瑾和我到鼓楼街东边大金台旅社找陈士渠司令员的政治部联系。我俩到后看到同志们正在收拾东西，我俩赶快说明我们是来找组织的。负责同志说：“接上级通知，已完成任务，现在撤退。你们还是留在原地工作吧！”

1948年10月临近第二次解放开封前，有一天下午警察局领导王凌霄（地下党员）拿着局长的条子，要陈瑞电（这时陈调总局任科长）快出发，截留国民党省政府、河南大学的一批文物图书和档案资料，王说：“这些物品已装车，停在公路局，明天运往南京，你负责去扣留，没有总局命令不准开车。”次日陈瑞电把所有物品押回原单位，胜利完成任务。

1948年10月28日开封第二次解放，王凌霄、陈瑞图去找陈瑞电谈话，问他愿不愿参加革命工作。陈瑞电说：“我不走就是为了参加革命工作。”王凌霄说：“市政府通知你谈话。”当天他准时到市政府，接见他的是市政府秘书长刘鸿文，他说：“从现在咱们谈话开始，你就算参加革命工作了，你回去马上恢复岗哨站岗，维护社会秩序，警官扯掉警服上的领章、帽徽（当时我们的警服还未到）。同时设立警官、警察登记处，你亲自主持。”陈瑞电非常激动地说：“我参加革命了。我决心跟共产党走。”

随后，陈伯瑾、陈瑞图、辛瑞芝和我一块又去找组织负责同志，樊伯泉同志说：“董金瑞同志到银行工作。”我回答说：“不行，我得学习。”我考入中原大学学习，毕业后随军南下，到汉口被分配到中共湖南省委工作。陈瑞图同志到开封市政府工作。陈伯瑾同志到开封市商联会筹备委员会工作。辛瑞芝同志到开封小学校教书。这样我们都到了妥善安置。自此，中共长葛县开封党小组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长葛旅汴同乡会也随着开封的解放而解体。

（作者董金瑞：长葛市大周镇小河董村人，三十年代晚期中共地下党员。离休于湖南省。）

长葛飞机场事件始末

马云生 口述/张长义 整理

一、事件的发生发展

1953年2月，县委准备召开全县区、乡、村800多人的扩大会议。主要是把党的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向大生产运动。一天上午，许昌地区筹建飞机场领导小组负责人李振农同志，从和尚桥区政府给我打电话说，叫我去和尚桥和他们见见面。我到了和尚桥，李说：“准备在你们时庄这个地方修建飞机场。”我说：“行，咱去看看那个地方。”李又说：“地方已经看过了，就在那里修建。”我说：“那好，现在你们先不要宣布，给我3天的时间，让我们做些群众工作，做好了你们就修。”李又接着说：“你先不要做，省里已经定啦，我们已报中央军委，还不知道军委同意不同意，等军委批转回来了，再通知你们做群众工作。你们做了工作，我们再行动。如果军委不同意，我们就不通知你了。”这样说了以后，我就回县参加三级扩大会议。这个会议开了5天，在散会的那天下午，修建飞机场的勘察人员和保卫人员开着两辆汽车，拉着修建飞机场的器材和标志到了时庄。他们在时庄号房子，并在地里打桩。群众莫明其妙，问：“你们是干啥哩？”他们说：“修飞机场哩。”这样，消息很快地在群众中传开并引起群众的不满。当天下午，时庄的党员、干部从县里开完会回村后，首先遇上了这个问题。干部对县里埋怨说，这么大的事情，也不给我们通一下气，叫我们怎么办？干部垂头丧气也不愿管了。到晚上，县里才发觉了这个问题。第二天，就派县长王涌同志带了8个科局长去时庄做群众工作。而王涌同志到那里后，没有对工作做具体安排，就往许昌参加学习修建飞机场的经验去了。当时，县里领导除我患感冒在机关外，其他同志都深入各区农村搞生产大转变去了。两天后，王涌同志从许昌回来，少数群众已经闹起来了。在那里工作的干部有的已经挨了打，如公安局副局长孙长发同志就挨了打。这时，在群众中还流传着一个谣言：说“这里是北京的南关，一搞修建，这一片的群众都得把家搬到新疆的沙漠地带。”这更加重了群众思想的混乱。王涌县长从许昌一回到和尚桥，就被群众包围了。群众提出不同意在那里修建机场，叫王县长答复，王县长为了缓和紧张局势，便对群众说：“我可以向上级建议，在大周的岚川

府一带的沙土地上修机场，须经中央批准，要五天的时间才能答复。”群众说：“县长说的对，我们拥护，不打县长了。”当时群众情绪仍然很不平静。到夜里，有20多个村一万多人，打着灯笼、火把，扛着枪闹事造声势，整闹了一夜，直到第二天还没有散。在当天晚上，我知道群众聚集一事，就通知武装部门，调了两个连的基干民兵。一个连在城内把住城门，不让群众进城闹事。他们在城外不管怎么闹不要管。另一基干连去到和尚桥占住铁路以东地段，保护好铁路。只要他们不毁铁路不要管。等到天明时，我们再去群众工作。当天夜里12点，筹建飞机场的同志给郑州飞机场打了电话，调了部队的一个连到和尚桥。许昌地区公安处处长周刚也带了公安队员40多人赶到了和尚桥。这时，时庄群众已把修建飞机场的保卫人员包围在一个小楼上。并叫喊说：“你们下来，不下来就要烧楼了！”周刚、李振农给我打电话，汇报了时庄群众包围了保卫人员和要烧楼的事情。还说：“我们准备去包围时庄，要开枪打。不然，我们的战士就危险啦。”我说：“不要去包围，也不要开枪。他们是吓唬哩，长葛的群众不会去烧楼。”由于我坚持不同意向群众开枪，他两个就按我的意见办了。我还说：“把调去的部队布置到铁路以东地段，看好铁路就行了。明天，我去做工作。”第二天早上，我就到了和尚桥区政府，碰见省委秘书长史向生也在那里，王涌同志也在场。王涌同志汇报了群众活动的情况很严重，我说：“我去，我不怕。”我和通讯员就要去，史向生同志说：“老马！你不要去冒险。是否用你的名义写个信。叫他们派代表来和尚桥谈判？”于是我就以我个人名义给群众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老乡们！你们不要闹，闹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你们可选出代表，到这里来商量解决。”我们一面派人去送信，一面在和尚桥东边搭了个棚，摆上桌子、茶水，准备与代表谈判。信送到时庄后，那里集结的群众有万人。有些村的个别党员和积极分子也来参加了闹事。把信向群众一念，有的说：“马政委来信了，让派代表去商量。”有人煽动说：“那叫谁去？要去都去，要不去都不去。”在这时，群众就一轰而上，往和尚桥冲过来了。我们的干部都在谈判的会场里等着他们派代表来谈判。这时，许昌地委组织部长刘平打来电话叫我去接。刘部长为啥在这时给我打电话呢？他在许昌听说我们被包围在楼上了，群众要烧楼。如果，我接了电话，就说明我没有被包围；如果，我不能接电话，就说明我被包围了。我接住电话，问道：“你是谁？”他说：“我是刘平。”他问：“你是谁？”我说：“我是马云生。”我们正在讲话中，我听到枪声响了。我说：“已经开枪了，出问题了，咱不说吧。”我就往出事的现场去了。

开枪的经过是这样：冲上来的群众离和尚桥有一里多远的地方时，我们的武装人员看到群众冲上来了，就朝着天空鸣了几枪，听到枪声，群众都跌倒在地上。这时，有人煽动说：“他们是朝天空打的，不敢打我们。冲啊！”群众就起来又往前冲，一直冲到离我们的武装人员很近时，我们的武装人员才朝着他们往前冲的前边的地上打了几枪。有4个冲在最前边的群众，被打伤了腿的下部。这一下，后边的群众便一哄而散。

我到了出事的现场，见到有4个年轻人挂了彩，在地上躺着。他们一见到是我，就哭着对我说：“马政委！我们不来，他们非叫来。”我批评他们说：“你们闹啥哩！有问题应当通过组织反映解决嘛！”随后，我们安排了4副担架，把4个受伤群众抬到了县医院治疗。

二、对事件的处理及善后工作

为了作好“事件”的善后工作，我立即回到和尚桥区政府，电话通知各区的县委委员到和尚桥参加县委会议。经会议研究：每个县委委员都要深入到出事的大村去作群众工作。首先要向群众认错、赔礼道歉，然后，宣传贯彻国家的搬迁政策，并揭露批判坏人的造谣破坏，以安定群众思想。时庄是这个“事件”的重点村，我分工去到时庄。入门村后，十家有九家闭门不出。在街上碰见一些老头老婆，给他们说话，他们装聋做哑不理睬。我给他们说：“错误在我们，你们没问题。我们来是给群众赔礼道歉的。”我这样一说，群众的脸色也好啦，他们就主动喊群众说：“都出来吧，马政委给咱赔礼来了。”群众集中起来后，我对着群众说：“首先向老乡们承认错误，不怨你们。我们的主要错误是没有认真地把工作做好。”接着，给群众讲了今后搬迁的具体政策。群众一听，都变成了笑脸说：“你昨天怎么不来？要早知道政策是这样，还能闹起来。”经讲解后，群众很高兴，思想也安定了。各村都是这样做的。

中南局得知这一事件，派纪检委副书记带领省监察部门的干部到时庄进行现场调查。我向他们如实汇报了情况，他们下去又作了调查。回来说：“老马说的情况属实，经我们调查也是这样，研究处理吧。”他们提出的名单是要处分3个人：李振农、周刚和王涌。他们说了后，我首先表示说：“处分这三个人我同意，因为他们犯了错误，打伤了4个群众，受处分是应该的。但是，我提一个意见，在县里来说，我是班长，王涌是副班长，要处分，也得处分我。哪有犯了错误，只处分副班长，不处分班长的道理呢？必须得处分我。”他们不同意处分我，我却坚持要处分我。一时争执不下，最后，他们说：“咱到许昌地委定吧。”我坐着他们的汽车一块到了许昌。参

加会议的有地委书记纪登奎、组织部长刘平，还有我和中南局与省里来的同志。他们在会上把处分那三个人的理由说了一下。我说：“处分他们我完全同意。他们犯了这么大的错误，给他们处分是应该的。但，我是班长，县长是副班长，哪能处分副班长不处分班长？不处分我，我不同意。”纪登奎表态说：“我同意老马的意见。因为他是书记应该处分他。但是，我是地区的一把手，下边出了问题我有责任，也应该处分我。不处分我，我也不同意。”刘平同志说：“电话是我给老马打的。因为打电话，引起来这个问题，我也得受处分。不处分我，我也不同意。”这样，受处分的人由3人变成了6人。在会上，自己提出要求受处分的3个人，都是不处分谁谁也不愿意。最后决定，把6个人全部上报，叫上级来定。经中南局李雪峰同志批准：因修建飞机场是初次，没有经验，一律不给处分。对那3个人的错误，只是在内部发了个通报。

毛主席知道后，批评说：“你长葛的干部敢打群众，群众打你的扁担，不亏。”

1956年11月15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讲到这件事：“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后来，向农民好好说清楚，给他们作了安排，他们的家还是搬了，飞机场还是修了。……共产党是要接受教训的。”

关于做善后工作与动员群众搬迁工作时，我就亲自住到时庄。修建飞机场，需要搬迁的群众有110多户、500多口人，占耕地1100亩。当时，全县各村农会在土改中都留的有土改果实（耕地和房屋），县委要求各区、乡、村都要做好安置工作。并领着搬迁户到准备搬去的村子看了房屋和安置情况。安置的原则是：家里原有多少房，到那里还给多少房；家里原有多少地，到那里还给多少地。在质量上是：只能比家里好，不能比家里坏。经过搬迁户群众普遍看了后，都同意才搬迁。有安置任务的村庄，派车把搬迁户的东西接过去，并教育群众要热情欢迎。全县只用了3天时间，就顺利地搬迁完了，没有出任何问题，搬迁户也非常高兴。

当时，国家有规定：因国家建设占地，占群众每亩耕地赔偿费为400万元（旧币，以下同），相当于现在的400元人民币，占群众住房每间赔偿费为300万元。修机场需占用的耕地1100亩，因时庄与外村的耕地有交错插花地。为了便于赔偿，将插花地都调整为时庄的耕地。这样，占耕地1100亩需赔偿44亿元，占群众住房510多间需赔偿15.3亿元，共计需赔偿59.3

亿元。这些费用都是从各村农会的斗争果实中解决了，没有让国家拿钱。

从这个“事件”中，我们总结有四点情况需要说明：

1、我们的工作被动，事前没有给群众讲清搬迁的赔偿政策，引起了群众思想混乱。

2、修建飞机场，上下行动没有疏通。

3、通过这个事件，考验了长葛县群众觉悟是高的。虽然闹事厉害，但他们一旦明白了国家的政策，还是服从国家建设的需要，听从政府的安排。那些接受安置搬迁户的村庄，广大群众也表现了极高的爱国觉悟，为了国家建设，对搬迁户照顾既热情又周到。

4、通过这个事件，也考验了我们的干部队伍。有的同志虽然挨打、挨骂、吃不上饭、睡不好觉，但仍然是苦口婆心地去说服教育群众，不叫苦叫累，树立了干部队伍的形像。

（口述者马云生：解放初曾任长葛县委书记；整理者张长义：曾任县政府秘书，后调任禹县工作。）

1949年~1978年长葛县 主要政治运动大事记

(此文由路志纯根据中共长葛市党史研究室编纂的
《中共长葛党史大事记》选录)

1949年10月8日

中共长葛县委、县人民政府在县城(今老城镇)举行了数万人参加的大会,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与此同时,全县各区也召开了空前规模的庆祝大会。

1949年12月

中共长葛县委对全县剿匪反霸工作进行了总结。总结指出,一年来,呈请批准枪决罪大恶极的匪特74人,捕捉伪县长张曼云、国民党县党部书记路木森、县党部委员李子杰等大小匪特86人,争取、瓦解、登记、悔过的匪霸2000余人,收缴匪特长、短枪2700余枝,子弹40000余发,训练改造登记匪伪人员11期481人,对国民党、三青团等组织建立了较系统的档案,对会道门情况有了初步了解,并对一贯道、青红帮、引济局、积善堂等会道门组织,整理出了较系统的材料。一年来没收匪霸土地22251亩,约占其土地的20%。通过一年来的剿匪反霸斗争,在政治上打击并瓦解了其反动势力,在经济上触动了维持其反动势力的基础——土地,从而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1950年2月7日

中共长葛县委、县人民政府在和尚桥区进行土地改革运动试点。3月,土改运动在全县全面进行,5月20日土改运动结束。土改中全县共划地主3057户,富农1936户,没收及征收地富土地34万亩,分给没有或少地的

贫雇农民。历时3个月的土改运动，结束了封建土地剥削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1951年1月至2月颁发了土地证。

1950年11月

中共长葛县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和许昌地委的部署，在全县开展了长达2年零9个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运动分3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从是月开始到1951年10月，主要是行政镇反，即在县委的统一领导下，以专政机关为主，各界人士配合打击敌人。通过调查摸底，从12月3日开始，全县三次统一行动，捕捉反革命分子1173人。第二阶段从1951年11月至1952年11月，主要是结合“三反”、“五反”运动，继续进行深挖暗藏、漏网的土匪、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首领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通过这一时期的发动、揭发、调查、外捕，共逮捕各类反革命分子330人。第三阶段从1952年12月至1953年7月20日，这段镇反的重点是，逮捕漏网的反革命分子，结合民主改革和民主运动，全面开展取缔反动会道门的斗争，进一步肃清残敌。此一时期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对有罪恶、民愤极大的反动道首及摸底掌握已漏网的土匪、恶霸、反动党团骨干等统一逮捕，共逮捕52人。通过镇反，基本上肃清了残留的反革命分子，有力地打击了反革命势力的嚣张气焰，加强了人民民主专政，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纯洁了党、政组织，保障并推动了各项工作的开展。

1951年12月中旬

中共长葛县委根据中共中央12月1日《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和12月3日《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及《关于发动党内外群众大张旗鼓检查和惩治贪污人员的指示》，集中全县各机关单位507人，进行“三反”学习。直到1952年4月21日，全县的“三反”运动正式进入检查、坦白、揭发、批判、处理等实质性阶段。同年7月1日全县“三反”运动结束。在507人参加的“三反”运动中，有贪污行为的247人，其中贪污百万元（旧币）以上的62人，贪污百万元（旧币）以下的185人，除情节严重的给予必要的刑事、党纪、政纪处分外，自动坦白退赃的都免于处分。

1954年8月15日

为适应国家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需要，根据中共中央、中央中南局关于精简行政机构指示精神，并经中共中央、中央中南局批准，中共河南省委发出指示，决定将郑州专区的洧川县与许昌专区的长葛县合并，合并后称长葛县，并划归许昌专区领导。月内合并工作结束。是时，长葛县辖原洧川县的6个区和原长葛县的7个区，共13个区，134个自然村，97595户，482546人，辖区土地971平方公里，耕地1047859亩。

1957年3月9日

中共长葛县委对去冬今春整社工作进行了总结。总结指出：整社工作从上年12月开始，到2月9日基本结束。全县共抽调干部629名，整顿了129个农业社。在整顿过程中，贯彻“民主办社”、“勤俭办社”的方针，以改进农业社的经营管理，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强迫命令为中心，开展整社工作。经过发动群众，提高认识，落实责任，改善管理，促进生产等一系列整顿工作，使农业社一类社由40个提高为74个，占57.36%；二类社由58个变为49个，占38%；三类社由31个降为6个，占4.65%，从而巩固了农业社，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1957年5月2日

中共长葛县委对春季生产救灾工作进行了总结。县委从县直各单位抽出151名干部分包33个乡，171名乡干部分包49个受灾社，637名社干部分包730个队，2550名队干部分包了29315户灾民。通过逐户访问摸底，全县解决了缺粮社员20869户，79526人的生活困难，销粮97.163万斤；发放救济款11.5009万元，帮助缺钱户30018户，124243人；赊销煤136万斤，解决了6864户，39327人的缺煤问题，稳定了灾民生活。

1957年10月11日

中共长葛县委根据上级指示，决定在全县开展全党全民性整风运动。在

整风运动中发动群众说心里话，以帮助整顿作风，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宗派主义。整风运动中还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来辨明大是大非，以达到边整边改，教育干部和群众，坚定社会主义道路的目的。整风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错误的和过激的言论。在这种情况下，县委根据中共中央有关反击右派进攻的指示精神，开展反右派斗争，历时1年零6个月，于1959年4月结束。全县被划为右派分子的810人，反社会主义分子45人，因右派问题戴上各种帽子的228人，共计处理1083人，占参加整风人数4680人的23.4%。由此，严重伤害了一批同志，影响了革命事业的发展。

1958年1月12日

中共许昌地委批转了共青团许昌地委《关于长葛三中开展劳动与勤工俭学情况的报告》。《报告》指出：长葛三中几年来贯彻执行了中央提出的“劳动教育，勤俭办学”的教育方针，正确解决劳动与学习的矛盾，组织领导师生参加义务劳动，利用学校122亩土地，划分粮食、果圃、经济作物、蔬菜等六个试验区。自己动手，劳动建校，不仅提高了学生劳动观念，增长了农业知识，而且增加了学校收入。1957年年底收入小麦18000余斤，红薯17000余斤，花生3800斤，各种蔬菜27000余斤。同时，向社会推广了新技术，为社会培养了一批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有一定生产技术的新型农民。1957年该校毕业生升学率达25%，长葛一中的升学率为12%，二中的升学率为13%，而许昌地区的升学率为15%。没升学回农村的有53人被评为劳模和优秀社员，还有的被选为生产队队长、生产队技术员。长葛三中成为许昌地区的先进学校。随后，长葛三中勤工俭学的情况，逐级上报到团中央及党中央，受到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的表扬。1月20日，《人民日报》以《两个好榜样》为题发表社论，宣传长葛三中勤工俭学的经验。从此，长葛三中闻名全国，到年底全国有23个省、32个城市、244个参观团、21415人次到该校参观学习。

1958年2月17日

中共长葛县委召开县、乡、社三级干部会议，会上制订了全面跃进计划。提出了“下决心、拼命干，百日根治大自然，今年跨淮河，明年过长

江，三年实现千斤县”的行动口号。同时《长葛报》开辟“比一比哪个乡跃得高、进度快”专栏，指导全县各乡生产跃进情况。

1958年3月12日

中共长葛县委发出“人人献计，大胆创造”的号召，在全县掀起工具改革的群众运动。26日，县技术改良促进会召开，各乡党委书记、各社党支部书记和先进工具发明者共计1300余人参加了工具改革展览会。展馆分水具、肥料、磨面、农具、运输、工业等6个展区，共展出改制和发明工具114种，7182件。在展览期间，全国有18个省的76个县，19736人次到长葛参观学习。中央和省市新闻单位闻讯而来，河南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丁希凌按照省委指示，亲自率领著名编辑、记者前来坐镇指导，先后围绕长葛县的深翻改土、工具改革和耕作园田化发表了不少重要消息和经验性文章，并配发了三篇社论。中国农业出版社于8月专门出版了《长葛深翻土地》经验一书，发行全国，影响甚广。北京新闻纪录制片厂、上海科学艺术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河南科普制片厂分别摄制影片，在全国映出。

1958年3月20日

中共长葛县委制订出《长葛县1958年~1962年全面发展规划（草案）》。《规划》指出：1958年~1962年全县的奋斗目标是：粮食，1958年保证亩产1500斤，总产135520万斤；1962年保证亩产3000斤，总产285000万斤，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总产增长10倍。1958年搞6个双千斤乡（6个乡指城关、坡胡、水磨河、后河、和尚桥、双庙），200个双千斤社。棉花，1958年达到亩产100斤，总产290万斤；1962年亩产达到500斤，总产1450万斤。

1959年年底实现水利机械化。1960年年底，要建发电站17座。粮食征购：1958年达到15000万斤。1962年发展到社社有商店，全县形成商业网，繁荣城乡经济。继续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规划》还对其他方面的工作做了具体要求，如把长葛县建设成为一个九化县（即水利机械化、农业机械化、农村电气化、运输现代化、绿化、四无化、人人有文化、电话广播化、科学普及化）。实践证明，此《规划》属高指标思想的产物，严重脱离实际，因而未能实现。

1958年4月14日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许昌地委书记赵天锡、长葛县委书记吕炳光等陪同下到长葛县视察。李副总理视察了和尚桥乡“五四”一社青年试验场的小麦和烟叶育苗，还到县城观看了长葛先进工具展览。

1958年5月4日

中共长葛县委第一书记吕炳光赴北京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5月5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在大会上他作了题为《土地大翻身，争取亩产800斤》的发言。5月13日，《人民日报》全文登载了长葛县委书记吕炳光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

1958年5月17日

毛泽东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对长葛县委第一书记吕炳光《土地大翻身，争取亩产800斤》的发言作了很高的评价。毛主席说：“感谢河南省长葛县第一书记的发言。这个发言很好，我又看了一遍，一年把112万亩土地全部深翻一遍，深翻一尺五寸，争取亩产几百斤。这就提出一个新问题，各县是否都能做到。河南长葛县能做到，别的县难道不行吗？一年不行，二年不行，三年不行？四年、五年就可以了！五年总可以再翻一次吧！我看五年总可以！他们第二个五年计划把全县的地都翻一遍。没有好工具就用长葛那样的工具，用他们那种办法。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没有别的办法，就用他的办法，也许还有别的办法。他的办法是：先把表层熟土翻一边，然后把肥料放在生土上，再用铁锨把第二层生土翻开，与肥料搅拌，打碎坷垃后仍放在下层不动，挨着翻第二行，把第二行熟土放在第一行生土上，依次翻下去，表层土不变。这是一大发明。深翻一遍增产一倍，至少增产百分之几十。增产的措施土壤应放在前边。”毛主席对此给予高度评价之后，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先后组织参观团前来长葛学习。

1958年7月11日

全国土地深耕、土壤改良、工具改革流动现场会在长葛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农业、工业、商业部门的代表，中国农业科学院和部分地区的农业科学研究单位，及部分省的专区、县有关单位的代表共200余人，会议由农业部顾副部长主持。会议要求在全国推广长葛县深翻改土的经验。

1958年8月7日

下午1时30分，毛泽东主席在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书记处书记杨蔚屏等陪同下，乘火车由襄城县来长葛县视察工作。列车停稳后，首先由县委第一书记吕炳光、副书记王连安到火车上向毛主席作了相识介绍，然后毛主席走下火车乘吉普车到宗寨（当时的“五四”农业社，现八七村）视察玉米和谷子的长势情况。

1958年8月8日

中共长葛县委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的方针，和地委工业会议精神及地委分配的任务，确定全县炼铁保证5万吨，争取7万吨，建炉1227个。30日，县委决定成立钢铁生产委员会，由县委书记吕炳光任主任，以加强领导。此后全县各地共投资690余万元，参加钢铁生产的工人13000余人，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边建炉、边生产。为保证钢铁生产的原料供应，动员群众毁锅炼铁，造成劳民伤财，在群众中影响极坏。到1960年停止钢铁生产，亏损320余万元。

1958年8月18日

长葛县第一个人民公社董村人民公社成立，接着全县迅速掀起成立人民公社的高潮。到25日，全县由20个乡并转为18个人民公社，下设92个管理区，1809个生产队，实行人民公社、管理区、生产队三级管理体制，实

行政社合一，一大二公。

1958年9月3日

中共长葛县委在浮夸风的支配下，写信向毛主席报喜：全县 100210 亩早玉米获高额丰产，总产 3309 万斤，亩产平均 3303 斤，比 1957 年亩产 248 斤增长 12 倍多。万斤以上的玉米卫星 204 颗，面积 310 亩，其中 15000 斤以上的玉米卫星 21 颗，面积 37 亩，2 万斤以上的玉米卫星两颗，面积 1.695 亩，最高玉米卫星为 22234.9 斤，这种浮夸虚报在群众中造成极坏影响，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

1958年9月下旬

中共长葛县委召开麦播会议，研讨小麦增产计划，省委领导史向生、赵文甫、杨蔚屏、杨珏等参加了会议。会议在反右倾、鼓干劲思想指导下，不切实际的指标一破再破，计划性卫星一放再放，到麦播时，违背科学，要求亩播种量达 100 至 200 斤，实行高度密植，致使小麦发育不良，造成严重损失。

1958年10月2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来长葛县视察教育工作。陪同前来的有中共河南省委文教部部长张柏园、许昌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朴等。康生一行主要视察了长葛三中（现尉氏县三中）勤工俭学的情况，听取了学校领导关于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学校同群众相结合的经验汇报。

1958年11月27日

中共长葛县委对整风运动中开展“拔白旗、插红旗”工作进行了总结。县委在对整风运动的总结中指出，全县先后在国家机关、学校、财贸、工厂等单位开展“拔白旗、插红旗”，共计拔掉资产阶级的“白旗”71人，其中机关干部 18 人，占干部总数的 0.16%；工厂工人 7 人，占工人总数的 0.31%；学校 46 人，占教师的 3.1%；农村拔掉小组长以上的干部 234 人，